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先秦诸子蠡测

吕文郁一著

非外借

 科学出版社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先秦诸子蠡测

吕文郁—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来有关先秦诸子方面的研究成果。全书内容包括对先秦诸子人物生平的探讨,对诸子之书的学术观点和内容的探讨,以及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探讨先秦诸子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依据近年新发现的地下出土文献对先秦诸子研究中的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

本书可供高校文史哲学科师生、广大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诸子蠡测/吕文郁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9

(荔园国学丛书/景海峰主编)

ISBN 978-7-03-057972-0

I. ①先… II. ①吕…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1644 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周 爽/责任校对:郭春蝶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 3/4

字数:463 000

定价:1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始于 1984 年，在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兴起之前，已着先鞭。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1983 年 9 月即诞生了特区的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并在建校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当时，国学一词并不流行，国学之说尚有禁忌，为什么会用这个概念来命名一所人文学术研究机构？这就要从它的创办人汤一介先生说起了。汤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他在 80 年代初赴美访学时，接触到了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许多新信息和新理念，这在当时封闭的状况下是有很多新鲜感和强烈刺激的，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在他与夫人乐黛云教授一起回国之后，恰逢深圳大学正在筹办，于是应张伟校长的邀请，乐先生出任了中文系的主任，并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而哲学系暂不能成立，只好先办一个偏重中国哲学的研究机构，这便是国学研究所，由汤先生主持。国学一名，当时的人们并不熟悉，但具有家学渊源的汤先生却不陌生，民国时期的北大即有国学门，办有《国学集刊》，而矗立其间的“台柱子”便是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所以，当时用了国学之名，究诸原委，实有其缘，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就另当别说了。

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恰是当时国内的文化大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在汤先生的带领下，国学所的同仁们投入其中，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举其要者：一是创办了大型的国际性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先后出版 4 辑，发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二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集中了一批中心城市的知名学者制定规划，对 80 年代后期国内“文化热”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与当时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届国际“中国学”研讨班，为全国 30 余所

高校培训了 100 多名从事比较文化和汉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四是较早和海外的学术界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与香港的几所高校有了密切的交往；五是在古籍整理方面，参加了广东高校“岭南丛书”大型项目，并在古籍整理的电子化方面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在当时都是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国学所在深圳大学建校之初的 80 年代，也为学校的文科建设，特别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积累，为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高校的人文学术遭遇了寒流，传统学科一蹶不振，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也一度沉寂了下来，几乎陷于停顿。正所谓斗转星移、时事难料，在学院内部的传统文化研究遇到顿挫、文史哲学科陷于生存困境之时，在市场经济活力的冲击和挟裹下，此时在社会上却悄然兴起了一股国学潮，传统文化在社会上有了复苏的迹象，国学理念也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熟知。这个翻转本身就很有戏剧性，而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学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大国地位的显豁，则演绎出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剧情，锣鼓铿锵、人腾马跃、各色粉墨、正谐相随，一幅好不热闹的场景，实为近代以来所罕见。

经过了 20 年的发展，国内的国学热，潮涨潮落，几度翻腾，浪花相逐，亦泡沫堆积，呈现出了远比最初的时候要复杂得多的面相，可以说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到了今天，对国学的理解和国学之研究早已不是往昔的景象了，也已不具有解释的统一性，其边界宽泛得已经让人无话可说；无处不在的国学、无人不谈的国学，五花八门的杂乱样子，又几乎让人不忍置喙，不知从何处落脚了。清代学者凌廷堪（1755—1809 年）在论及天下学术变迁之大势时，有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校礼堂文集》卷 23）而当此时此刻，国学作为一种时代的表征和映照学术潮流之走向的标尺，是处在“将变”“既变”之际邪？抑或已经有了一点“天下

相与安之”的苗头呢？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之，或者采取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行动来对待之，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必强求一律，更没有必要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来，判断权完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

作为高校的国学研究，当然有它的学术持守，不能随波逐流；有它的学科规范，不应漫越无度；有它的独特责任，不必包打天下。做自己应该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做自己必须做的，是从事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的职责，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集中了文史哲三个学科门类的人马，在国学研究所和国学本科实验班的基础上，又于今年新成立了国学院，隶属于学校，挂靠在学院，实行一体两牌的互动机制，凸显出国学研究的平台性、基础性和融合性，以国学来寻求人文学科之间的内在交融和体制创新，以博雅教育为宗旨，努力为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创造新的增长点。根据我院现有的学科优势和师资特色，新的国学学科架构，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努力寻求国学建设的突破口和国学发展的新路径，强调融合文史哲不同学科之间的力量，以凝聚起人文基础学科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为提高深圳大学文科建设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和目标，我们在学校领导和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申报了“以国学为平台的人文基础学科融合与创新”项目，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作为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之一，我们编选了这套“荔园国学丛书”，集中收入我院教师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著，以贡献予社会。

深圳大学地处南国，荔子飘香，别号荔园。每年的6月份，荔枝成熟，挂满枝头，又是一年丰收时，也恰临毕业季。校园里，行将走入社会的学子们，身穿蓝袍，穿行于红荔绿荫之间，构成了一副最美的图画。我们的“荔园国学丛书”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校园美景一同诞生的，愿它像学子们一样，带着成熟，带着希望，走遍天涯。

景海峰

2017年6月5日于荔园

代 前 言

——我与先秦诸子研究

我 1964 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开始读大学本科。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仍处于艰难的调整和恢复阶段，读书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那时都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读书都很刻苦。我在中学时即爱读古文，课本上所有的文言课文在老师讲解前都能背诵。也常常找一些课外读物上的文言文诵读。上大学后我偏爱中国古典文学，凡是与古典文学相关的书我都爱读，那时我们都对未来都满怀憧憬。不料我们的学习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便席卷中国大地，全国的大、中、小学全都“停课闹革命”，我们的大学之梦被这场“文化大革命”辗压得粉碎。1970 年，我们这些在学校里待了 6 年的大学生被当作“废品”从校园里扫地出门，我被“发配”到一个因“战备”需要而建在深山老林中的三线军工企业，到那里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并从事与专业兴趣毫不相干的行政工作，一干就是 10 年。

1980 年我有幸考回母校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金景芳先生学习先秦史。因为有当年古典文献和古汉语方面的功底，在阅读和使用先秦文献方面自己并不感到很吃力，与同届的其他研究生相比，甚至还感到有一定的优势。两年的专业课学习结束后，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我在专业课学习期间就已确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即“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并较早地开始为写作学位论文进行资料准备。为此我认真地通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韩诗外传》和先秦两汉诸子的主要著作，并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摘录了近千张学术卡片。此前我虽然读过一些先秦两汉的诸子著作，但除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读得较熟外，其余多属选读。这次为了

写学位论文，我把以前未能通读的先秦两汉诸子之书基本都通读了一遍，虽然有些书读得还不是很细，但总算统统浏览了。同时还把近现代学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尽可能找来参考。读过这些书之后，我已经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士”这一研究课题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学位论文心里也有了底。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是当时社会上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在那个剧烈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士阶层自身也在不断地分化和蜕变。士阶层品类繁多，成分复杂，战国时期这一特点尤为突出。上至执掌邦国大权的卿相，下至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流，都可以称之为士。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中坚和核心是那些驰骋于“百家争鸣”历史舞台上的文化精英。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为士阶层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当时的士阶层中可谓藏龙卧虎，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明星。我依据自己整理的资料，认为写一篇十几万字的学位论文应无问题。但开始动笔写作时，当时的主管部门吉林大学研究生处明确要求文科硕士学位论文的篇幅不要超过三万五千字。受篇幅的限制，我不得不对原先提交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做了调整、压缩，原来设想的一些章节无法展开论述了。后来写成的《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实际上是一篇经过大幅度压缩的论文，有的部分类似论文摘要。如我原计划在论文中设有“士与‘百家争鸣’”和“士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两章，后来为了压缩篇幅，原来的这两章最后就压缩成两小节。这篇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可以说是我研究先秦诸子的起步阶段。原来准备的许多资料虽然未能派上用场，但是我觉得在论文准备阶段阅读的许多书使我获益匪浅，为我后来的先秦诸子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这篇硕士学位论文虽然得到了导师和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好评，但我自己感到还有好多想法未能充分表达，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一个因字数限制没有最终完成的研究课题。答辩之后，论文的前半部分曾发表于吉林大学《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这部分对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起源有一定参考价值。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曾一度想把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扩充，恢复最初的设计规模，把这篇学位论文改造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学术专著。可是由于留校后很快承担了其他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不久又准备考博、忙于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我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85年，我开始在导师金景芳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曾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深化，这样做省时、省力，也可以做得很从容、很有把握。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硕士学位论文准备阶段积累的现成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就此了却硕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意犹未尽的心愿，把当时因字数限制未能最后完成的学术课题彻底完成，也算对自己有个交代。可是当时还有另一个学术课题也一直在我心中萦回，那就是周代的采邑制度。采邑制度是周代分封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周代分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诸如三桓专鲁、田氏代齐、邑宰叛乱、陪臣执国命、三家分晋、县制的产生、分封制的崩溃等，都与采邑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密切相关。但是这一制度前人很少关注。我当时遍翻先秦史研究的各种资料汇编和索引，不仅找不到一部研究采邑制度的著作，甚至连研究这一问题的史学论文也找不到一篇。这一题目在当时可谓是填补空白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我清楚地意识到，研究这一课题必须从零开始，没有可供参考的相关研究成果，全部研究资料都要从头开始查阅。而且这一研究课题也有很大的风险，成功与否完全是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学术研究应当敢于冒风险，勇于探讨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具创新性、开拓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决定放弃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深化的选题，而把诱惑力更大、更有冒险性的周代采邑制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周代采邑制度研究》是一个社会制度史方面的研究课题，看似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百家争鸣”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一选题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关系密切。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卿大夫的采邑已经由西周时代官吏的俸禄形式演变成一级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卿大夫之家与诸侯之国一样，有自己的军队，也有直接为卿大夫之家服务的各种官吏，如家相、家傅、家老、家大夫，还有祝、宗、卜、史，家宰、邑宰、有司、司马、司徒（土）、司空（工）、马正、工师，等等，^①这些卿大夫之家的各种官吏基本上都是由士阶层来担任的。他们在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舞台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孔门弟子中有许多人都曾在各国的卿大夫之家担任各种官吏。

^① 详参拙著：《周代的采邑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增订版，第五章。

孔门弟子中的才华出众者如子贡曾先后任鲁、卫两国之相，^①而另一位孔门弟子子夏则在战国初期被魏文侯礼聘为师，^②子夏的门徒有好多后来都成为战国前期变法运动的旗手。这已经预示着士阶层大展身手的时代即将到来。这种深层次的关联也是采邑制度这一研究课题对我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得到导师金景芳先生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金先生在导师对学位论文的评语中这样写道：

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周代采邑制度研究这个题目，初时我有点不放心，觉得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及写出以后，简直出我意外，竟写得如此周详，如此博辩，如此大有关系，允称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纵观本论文的长处有下列各点。

一、能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从发展上看问题，既系统地阐述这个制度的产生、发展、变革和衰亡的过程，又全面地说明这个制度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具体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态。

二、阅读了包括古文献、古文字、考古以及近人有关论著等等大量资料，并进行了严密地分析。

三、得出的结论，诸如：

西周前期和中期采邑都集中在王畿之内，畿外各诸侯国基本上没有分封给卿大夫的采邑。

西周后期少数诸侯国开始在自己的领土内分封采邑，但数量不多，规模也比较小。

各诸侯国内大规模封授采邑是在王室东迁以后才开始的。

大体上说，西周主要是“天子建国”的时代，春秋前中期主要是“诸侯立家”的时代，春秋后期主要是卿大夫分封陪臣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分封制彻底衰败的时期。

西周的采邑主要是经济实体，卿大夫之家还不是一级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

春秋时期的采邑已经变成了诸侯国内相对独立的、封闭的小王国。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孔子弟子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页。

② 《史记·魏世家》。

采邑制度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从国家发展形态的角度看，西周时代王畿之内的采邑和春秋初期诸侯国内的采邑，都是统治者在无法对自己的统治区域实现更有效的统治的情况下产生的政治制度。西周和春秋初期的采邑可以看作国家机器的辅助机构。一旦采邑在事实上已经变成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时，便无法与原来的国家机器共同协调运转。

县制绝不是某一位先哲圣贤的发明创造，它是采邑制度自身异化的必然结果，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采邑制度的直接对立物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封君制是采邑制在战国时期的残存形态。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前后并没有完全取消封君制。

汉代的食邑虽然渊源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采邑制，但其性质与战国时代的封君制更为近似。等等。

以上这些结论都是新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

导师 金景芳

1988年11月5日

导师金景芳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坚定了我对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信心。我坚信：只要按照导师指引的方向去刻苦钻研，努力探索，是一定能够在古史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的。

1985年3月，著名教育家、原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的《孔子评传》一书在齐鲁书社出版，1990年12月，这部《孔子评传》又被列入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匡亚明在吉林大学工作时常与我的导师金景芳先生有交往。他很早就对孔子研究有兴趣，知道金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孔子研究专家，常常与金先生一起讨论有关孔子的一些问题。后来匡亚明在南京写作《孔子评传》时，还不时地给金先生写信，交流和探讨写作中遇到的一些学术问题，金先生也一直在关注匡亚明《孔子评传》的写作。《孔子评传》的初版和增订版发行后，匡亚明都及时地寄给了金先生，并诚恳地向金先生征询意见。此事对金先生很有触动，遂萌生了也要写

一部孔子传的想法。于是就找我商量，要与我分工合作，共同撰写一部新的孔子传。开始我有些迟疑，一是觉得自己以往在孔子研究方面下的工夫不多，怕难以胜任；二是因为当时我自己另有一个研究计划刚刚起步，短时间内怕没有精力顾及其他。我如实地向金老谈了自己的想法，金老说：孔子传的写作很重要，社会上很需要这样的书，我们完全有条件写出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孔子传。我在孔子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现成的研究成果，其中的好多成果都可以纳入我们的孔子传中。这部书的整体框架可由我来设计。全书大体上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孔子的生平事迹和伟大贡献，第二部分评述孔子的思想学说。在书的前面还应有一部分相当于绪论，主要是阐明如何评价孔子和孔子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书名就叫《孔子新传》。绪论和第一部分就由你来写。你自己的研究计划可以往后推迟一段时间，等《孔子新传》写完再进行。从现在开始，要把《孔子新传》当作主要工作来抓，其他的事都要给这件事让路。此时我已别无选择，只能照金老的吩咐，动手查阅有关孔子研究方面的资料，全力以赴地为《孔子新传》的写作进行准备。我承担的部分从资料准备到初稿完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金老看后还算满意，这是我正式进行先秦诸子研究的初步成果。在这部《孔子新传》的撰写过程中，金老又决定再增加一部分内容，即“孔学流传述评”，并交给学术助手吕绍纲教授来完成。全部书稿在1990年底全部完成，这部由金老、吕绍纲和我共同撰写的《孔子新传》于1991年12月由湖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2006年1月，长春出版社又出版了《孔子新传》的插图本。最近，北京又有一家出版社正准备出版《孔子新传》的第三版，而且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也正在与北京的这家出版社洽谈合作，拟同时在香港出版《孔子新传》的繁体字版。这表明广大读者对《孔子新传》的认可。

198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先秦史先秦文献研究室安排我给所里的硕士研究生讲授先秦诸子课程。这门课程是古籍研究所和历史系古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时，这门课是由导师金先生亲自讲授的。先生讲授这门课程的方法是先讲授一些有关先秦诸子的基本要点问题，然后指定一些诸子之书或书中的某些篇章让我们自己去读，并定期安排我们进行课堂讨论。先生则根据我们的课堂讨论进行点评，或有针对性地讲授一些诸子学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当时有

关先秦诸子课的课堂笔记都比较少，内容比较零碎，也不大成系统。后来金老招收的博士生越来越多，没有精力再给硕士研究生上课，先秦诸子这门课程便交由吕绍纲先生来接替。后来吕绍纲教授也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了，要讲授的课程也很多，于是教研室便安排我来接替吕绍纲教授给硕士研究生讲授先秦诸子这门课程。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式接手这门课程之前，曾用一年多的时间重读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和相关的研究著作，并编写了《先秦诸子通论》讲义。当然，我课堂上从不按讲义照本宣科。由于这门课程每年都有较多的选修者，我特别注意搜罗有关先秦诸子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不断地用以丰富《先秦诸子通论》讲义。特别是每当有与先秦诸子相关的地下出土文献问世，或者有对这些地下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问世时，我都广泛搜集、整理，及时向学生们介绍，几乎每一轮课程都有新的内容，学生们很有兴趣。开始阶段，这门课程的听讲者主要是古籍研究所先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古籍研究所和历史系其他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也来听课，再后来哲学社会学院和文学院的部分硕士研究生也有来听课的。他们有的要学分，有的不要学分，只是凭兴趣听听而已。由于课堂是开放的，我上课时从来也不点名，课堂上常有生面孔来“蹭课”，我也从不过问他们是哪个学院的，更不问姓甚名谁。有从学期开始一直坚持到学期末的，也有听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见踪影的。就这样，先秦诸子这门课程我连续讲了十几年，这门课程的讲义也就变得越来越厚。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那时萧克将军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和第一政委的岗位上离休，遂被推举为首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会长。萧克执行会长上任不久便开始策划、组织编撰《中华文化通志》。这是一套规模宏大、全面记述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史志类典籍。全书分为十典，每典各设主编一人，每典之内又各分十志，全书共一百志。每志一册，篇幅约三十万字；另加序跋、领导人题词、全书总目录、附录等一册，这部《中华文化通志》共一百零一册，总字数约三千万，可谓鸿篇巨制。《中华文化通志》总主编为萧克将军。各志的作者采取在全国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选拔，这在当时的中国应属首创。招标通告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的名义于

1992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有影响的大报同时发布。招标通告中详列了《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的名称及各典主编者的姓名，同时也标明了每一典所属各志的标题。我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招标通告后不免心动，觉得凭借自己的条件，有把握完成第一典《历代文化沿革典》中《春秋战国文化志》的撰写任务，于是就大胆地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投标。当时投标者很踊跃，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志，每个志的投标者就多达几十人，竞争比较激烈。不料我竟然在众多的投标者中幸运地成为中标者，承担了《春秋战国文化志》的撰写任务。招标结束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3年1月6日，将《中华文化通志》各志的中标者名单在上述各报刊同时发布，此事在当时学术文化界颇为轰动。

《春秋战国文化志》的撰写给了我一个全方位探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发展的绝好机会。在正式动笔之前，除了阅读我拟定的相关专业文献和研究著作外，我还曾认真地阅读并仔细地研究过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当我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置于“轴心时代”这样一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查时，对诸子百家的起源及其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便有了全新的认识，即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奇观绝非孤立的、偶然的历史现象。中国当时的诸子百家和古印度、古希腊及两河流域的先贤们都是“轴心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精英，他们是那个时代人类精神大飞跃的推动者、创造者，他们的创造力和思想高度让后人惊诧并叹为观止。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化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最为辉煌、最光彩夺目的一页，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秦汉以后任何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无法与春秋战国文化相媲美。此时我既为自己承担《春秋战国文化志》的撰写任务而感到荣幸，也为自己能否把这一伟大时代光辉灿烂的文化客观、完美地表述出来而感到忐忑不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不时地袭上心头，生怕自己的学力和水平难以胜任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撰写任务。这与当时积极参与《中华文化通志》投标时那种胜券在握的心态形成不小的落差。但事已至此，已经签订了合同，没有回头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干到底。

《春秋战国文化志》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春秋战国文化史的研究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历尽艰辛，但终于按期完成了书稿的写作。既然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文化志，当然要涉及这一历史阶段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教育、礼仪、风俗、科学技术、衣食住行、文学艺术等。但春秋战国文化的核心内容离不开诸子百家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和著作。《春秋战国文化志》的开篇是导言，题目为“轴心时代与轴心文化”，即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考查、评介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接下来的三章依次是：“深刻剧烈的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诸子人物及其著作”。这三章实际上都是围绕“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来展开的，仅“诸子人物及其著作”一章就分为15小节，这几章的文字总量约占全书的一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我为研究生开设的先秦诸子课程和我编写的《先秦诸子通论》讲义。我在备课和编写讲义时搜集的许多有关先秦诸子的研究资料在写作《春秋战国文化志》时都派上了用场，我从中也体验到教学相长的乐趣。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于199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此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我本人撰写的《春秋战国文化志》一书于2007年在东方出版中心作为《断代文化史系列》的一种再版，书名改为《春秋战国文化史》。最近，北京一家出版社正在排印此书的第三版。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能以10年左右为周期而连续再版，表明学术界和出版界对此书学术价值的认可。近几年来，我从网上或朋友传递的信息中得知，国内部分高校已将拙著列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本科生的参考教材或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这本书的需求量。拙著能够连续再版，大概与此有关。

我从21世纪初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先后经我指导的博士生共23名。受我近年研究课题的影响，有五六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与先秦诸子研究有关。我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大体上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全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春秋末期和战国早期，是诸子百家酝酿形成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学派之间和平共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各学派之间虽特色分明但并不相互对立、互相批判；第二阶段为战国中期，是诸子百家自由争鸣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各派之间壁垒森严，相互批判，重在标新立异；第三阶段为战国晚期，是诸子百家融汇合流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个学派之间在相互批判的同时也相互吸收，注意融会贯通以完善本学派的学说，因而各个学派都涌现出一些集大成的人物或著作。我特别重视战国末期诸子百家逐渐合流的历史趋势，所以有意识地引导博士生选这方面的课题作博

士学位论文。如张铮的《荀况与百家争鸣时代之终结》，林荣的《吕氏春秋与百家合流》，曲文的《韩非与晚周学术》，都属于这类选题，他们的选题共同组成了晚周诸子系列。这几篇博士学位论文有的虽然做得并不是很理想，可以算作我引导学生对晚周诸子研究的一种尝试吧。因为指导学生做博士学位论文至少也是对自己研究课题的一种促进。

我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曾先后应几个单位的邀请，在成都、广州、深圳、湛江等地作有关先秦诸子的系列讲座。当时超星学术视频网站派记者对我的讲座全程跟踪录像，然后经过编辑们的整理、加工，把我的《先秦诸子十讲》系列讲座改编成六十四辑，挂在超星学术视频网上，以满足广大国学爱好者的需要，从而扩大了讲座的影响。能为发展学术事业，弘扬传统国学贡献绵薄之力，自己颇感欣慰。前不久，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注意到被挂在超星学术视频网上的《先秦诸子十讲》，约我洽谈，希望我略加整理后由该社出版，目前正在整理中。

我这些年来的先秦诸子研究主要以宏观研究为主。我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认识到，对先秦诸子的宏观研究虽然也很需要，其实当今先秦诸子更需要微观层面的研究，如对某一部子书进行重新注释、校刊、翻译、导读，或对其思想内容做深层次的研究、探讨，这需要更加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才有望取得突破。若天假以年，还想把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撰写一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史》。不知这一美梦能否成真，是所期盼！

本书汇集笔者近些年来有关先秦诸子研究方面的二十几篇文章和学术演讲。还有几篇，或因是演讲稿，偏重普及，学术含量不高，又因一时查不到出处，找不到底稿，在网络上也未能搜索到，故没有收入本书。

春秋战国时期之诸子百家实乃中华学术文化之渊薮，博大精深，有如汪洋大海，书中所收之拙文，不过是笔者学习先秦诸子时积累的一些浅见而已，谓之《先秦诸子蠡测》，并非出于谦逊，诚请读者不吝指教！

吕文郁

2018年3月15日

目录



丛书序

代前言

——我与先秦诸子研究

轴心时代

——从人类文化史的大背景看春秋战国的文化奇观 / 1

历代诸子百家起源论述评 / 10

士阶层的崛起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 26

诸子学与古史研究 / 62

易学与诸子百家 / 69

近半个世纪的出土文献与先秦诸子研究的重大突破 / 76

老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 126

《老子》兵书说平议 / 141

《老子》《周易》哲学思想异同论 / 151

儒学与中国古代的多元文化 / 163

论专制帝王的儒学情结 / 176

原始儒家的富贵观及其当代价值 / 190